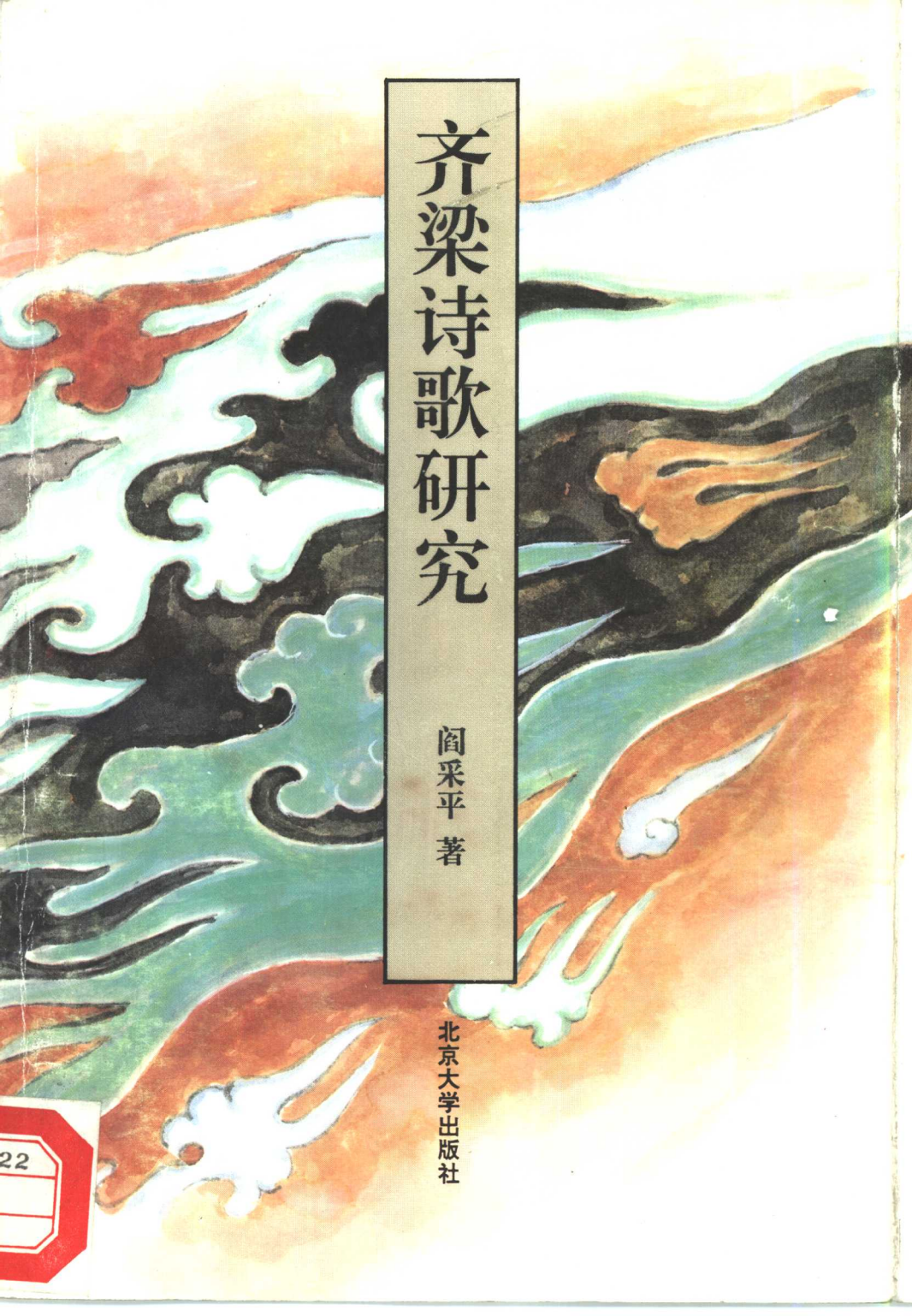




齐梁诗歌研究

阎采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207.22

30

齐梁诗歌研究

阎 采 平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梁诗歌研究 / 阎采平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5

ISBN 7-301-02417-7

I. 齐…

II. 阎…

III. ①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南齐(479~502) ② 文学研
究—古典诗歌—中国—南齐(479~502) ③ 古典诗歌—文学研
究—中国—梁(503~557) ④ 文学研究—古典诗歌—中国—梁
(503~557)

IV. I 207.22

书 名: 齐梁诗歌研究

著作责任者: 阎采平

责任编辑: 王春茂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417-7 / I · 31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0千字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8.80元

序 言

袁行霈

为学生的著作写序是一大乐事。1988年入学,和我相处三年,于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三位学生的博士论文相继出版了,并都要我写序,我于是得到了三次大的愉快,这真要感谢他们。

阎君采平入学前已是湘潭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基础本来就好。考入北大以后,寒窗三载,精研覃思,学识又大有长进,终于写出《齐梁诗歌研究》这样一部著作,作为学位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取得博士学位。齐梁诗歌一向遭受批评,这类批评陈陈相因,总不外是“华艳”、“轻靡”或“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等话语。真正对齐梁诗歌进行深入研究,对“华艳”、“轻靡”的诗风进行深入剖析的并不多。多年来,文学史的研究太着重于评判!谁是现实主义,谁是浪漫主义,谁是形式主义;谁是进步的,谁是保守的,谁是落后的;大而化之的评判代替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近来情况有所改变,简单化的弊病已经逐渐纠正。但在齐梁诗

歌研究方面,还没有看到一部有分量的深入的研究著作。由此看来,采平写这本书可以说是先行了一步。他不是简单地为齐梁诗歌翻案:过去说齐梁诗歌不好,就反过来说它好。而是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说法,从大量第一手资料出发,以史家的眼光对齐梁诗歌作了认真的清理,对种种文学现象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说明。他对齐梁诗歌创作特色的概括,对齐梁诗人集团的考察,都是很有见地的。这样就避免了简单化的评判所带来的种种毛病,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书末所附《齐梁诗歌研究资料选辑》,虽然搜罗远未完备,但总可以省去研究者一部分查阅资料的时间,也是有价值的。

我总觉得采平在学术上还有潜力,劝他不要放弃学术研究。虽然他目前从事研究的条件比较差,他也仍然想继续作些什么。做学问不一定非在大学或研究院不可,古代的学者有几个是在大学或研究院的呢?只要想做,有兴趣,入迷,而又有一定的条件,总是可以成功的。我期待着他拿出更多的成果来!

1994年1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目 录

序 言	袁行霈 i
第一章 齐梁文人人格	(1)
第一节 南朝士族的蜕变	(1)
第二节 齐梁士族文人的人格	(14)
第三节 文人人格与诗歌风格	(29)
第二章 齐梁文学集团	(44)
第一节 士、庶之间文化优势的对比与演变	(44)
第二节 齐梁文学三集团	(57)
第三节 文学集团的活动方式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74)
第三章 齐梁诗歌观念	(91)
第一节 情性与性灵的来源	(91)
第二节 情性说(上)	(101)
第三节 情性说(中)	(108)
第四节 情性说(下)	(119)
第四章 齐梁诗歌创作	(133)
第一节 写景	(133)
第二节 咏物	(149)
第三节 表现艳情	(164)

附 录

齐梁诗歌研究资料选辑 (178)

后 记 (271)

第一章 齐梁文人人格

第一节 南朝士族的蜕变

(一)

刘裕凭借武力夺得司马氏的天下，结束了士族专权的历史，复兴了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这个变化，标志着庶族阶层在政治上的崛起，也标志着士族阶层在政治上的退却。因此，这个变化影响士族至为深远。南朝几代，门阀士族作为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其政治素质和社会地位以此为转折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晋一朝，士族阶层执掌中枢权柄，在政治上与最高统治者平分秋色乃至凌驾其上。刘宋以后，皇帝的绝对权威逐步得到恢复，士族阶层从政治权力的顶峰渐次跌落到皇权的附属地位。从此以后，表面上，士族阶层依然保持着颇为优越的社会地位，实际上，用以维系这种社会地位的政治权力却被逐渐剥夺了。地位和权力发生分离以后，士族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了诸多的限制。这些限制回过头来又影响了士族的素质。

东晋一朝，是士族阶层发展的顶峰阶段。东晋王朝的建立和维持，始终倚仗着士族阶层的拥戴和襄助，所以，东晋一代皇室，一直受制于王、谢等几大家族，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这种政治格局，原因非止一端。就士族阶层来说，能够与皇室分享最高统治权，并且支撑这个王朝达

百年之久,与其自身的素质不无关系。换句话说,士族得以与皇室共天下,说明它还具备着运转政治的能力,至少它的代表人物是这样。以王、谢两家为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新朝,离不开王、谢二氏的支持和苦心经营。史称王导“比夫萧曹弼汉,六合为家;奭望匡周,万方同轨,功未半古,不足为俦。至若夷吾体仁,能相小国;孔明践义,善翊新邦,抚事论情,抑斯之类也。”^① 钱大昕也说:“导为元帝佐命功臣,历事三朝,以宏厚镇物,固称贤相。”^② 陈郡谢氏于东晋王朝,也有功匪浅。“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宸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③ 所以,东晋士族执掌中枢权柄,所依靠的并不完全是门资和名望,其素质和才能的作用,恐怕也不能忽视。

有鉴于前朝威权下移的历史教训,南朝几代皇室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在这些措施当中,对士族素质和社会地位发生过深刻影响的,首先是优借士族的制度。东晋以后,士族仍然一如既往,可以凭借世资,坐致公卿,位居清显。在诸如“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④ 之类法律条文的保障下,士族子弟“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苛求”^⑤。这样,士族阶层便渐渐失去其政治进取心。王、谢诸人以风流相尚,践行着宅心玄远而不废事功的处世方式。在地位和权力紧密结合的时候,这种处世方式并不妨碍士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社会条件变化以后,士族子弟对于祖宗衣钵的继承,只能得到宅心玄远的皮毛而失去不废事功的要

① 《晋书·王导传论》。

② 《廿二史札记》卷7第95页,中国书店1984年版。

③ 《晋书·谢尚谢安传论》。

④ 《梁书·武帝本纪》上。

⑤ 《南史·王骞传》。

义,从而导致其政治素质的全面退化。这种退化反过来又从根本上影响到皇权对士族的认识。萧贲曾经不无轻忽地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①梁世士大夫,“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②根源也在这里。尽管刘裕登基,以不得谢混奉玺绶为憾,萧道成受禅,也切望谢朓出而佐命。但那种举措,不过是皇权取悦于士族的一种姿态,目的是为了换取士族对新政权的认可和支持。

南朝皇室任用寒人以执掌机要,实际政权和军权的行使,在外藩,落到典签的手中;在中央,则被中书通事舍人等所控制。典签和中书通事舍人都是卑职和浊职,为士族所不屑为。然而却具有很大的权力。典签“威行州部,权重蕃君”^③,中书舍人“既总重权,势倾天下”^④。(萧齐)“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⑤南齐太尉王俭曾经不胜感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⑥贵重如萧子罕、王俭尚且如此,士族文人在典签、中书通事舍人面前战战兢兢、趋附之唯恐不及的情状,自然不难想象。

由此可见,地位和权力分离以后,士族手中所持有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名。社会地位的变化,伴随着士族阶层政治素质的变化。这一点又突出地体现为士族的参政意识及参政能力的变化上。刘宋一代,士族不甘心其失败,曾经企图夺回失去的权力,包括最高统治权。他们为此曾经作过一些尝试。例如,刘裕死,刘义符继位。司空徐羨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受诏辅政。刘义

① 《南史·恩倖·刘系宗传》。

② 《颜氏家训·涉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页。

③⑤ 《南史·齐武帝诸子·萧子伦传》。

④ 《南史·恩倖·吕文显传》。

⑥ 《南史·恩倖·茹法亮传》。

符不亲政事，游戏无度，徐羨之等人乃密谋废立。按照惯例，次第当立者为庐陵王刘义真。徐羨之等嫌忌刘义真^①，加之刘义真“轻动多过，不任四海”^②，为了持久地控制朝政，徐羨之等人乃先贬刘义真为庶人，再废刘义符，继而将义真、义符杀害，拥立荆州刺史刘义隆为帝。旋即谢晦出任荆州刺史，拥兵自重，造成和徐、傅等人内外呼应的局面。刘义隆即位以后，深恶大臣专权现象的重演，便宣布了徐羨之等人的罪状。徐羨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则从江陵起兵。兵败，谢晦被擒至建康斩首，时为元嘉三年；再如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被出为永嘉太守。“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再为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③。郑望生被派收系谢灵运，谢灵运乃杀郑望生并举事，且赋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④以张良、鲁仲连自比，公然表示对新朝的蔑视。随之被杀于广州，时为元嘉十年；又如，范晔等人蹈谢晦等人覆辙，图谋拥立义康为帝。谋泄，范晔等人伏死。时为元嘉二十二年；入齐以后，由于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杀的士族文人有二，一是王融，一是谢朓。就王、谢两人来说，情势又有所不同。萧贇死，王融谋立子良，未成。子良既不得立，王融被收下狱，于狱中赐死。这是王融的死因。东昏侯萧宝卷不堪帝位，江祐、萧遥光等人谋立江夏王萧宝玄。旋即又改变主意，拟立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派人“密致意于朓”^⑤，期与结为同党。谢朓不敢参与其事。不久，谢朓被遥光引为兼知卫尉事。谢朓大概是唯恐再被萧遥光拉拢，或者害怕因不受裹胁而遭到迫害，乃将江氏兄弟的图谋告诉了左兴

① 《宋书·刘义真传》。

② 《宋书·徐羨之传》。

③④ 《宋书·谢灵运传》。

⑤ 《南齐书·王融谢朓传》。

盛。事发，为萧遥光所陷，下狱死。这是谢朓的死因。王融之谋立子良，是积极主动的，王融的死，可谓咎由自取。而谢朓之被卷入皇室兴废事件，是消极被动的，谢朓的死，归因于其胆小懦怯的性格。即便是王融的死，也与谢晦等人不同。谢晦、谢灵运的反抗，敢于诉诸武力，而王融在得知子良不得立的消息以后，只是感叹了一句“公误我”^①。王融以后，类似的事件不复发生。士族文人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杀的现象基本绝迹。

谢灵运事件距谢晦事件的时间是七年，范晔事件距谢灵运事件的时间是十二年，王融事件距范晔事件的时间是五十二年，士族反抗皇权的频率越来越缓慢。谢晦和谢灵运不甘心轻易失败，不惜以武力抗争。范晔、王融则唯有束手就擒，俯首伏诛。士族反抗皇室的方式越来越软弱。反抗频率和方式的变化，说明士族自身素质的蜕化。谢晦从刘裕“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②，死前，为顾命大臣和统帅强兵的荆州刺史。可见，谢晦是具备着相当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的。谢灵运“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③。又可见，谢灵运至少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曾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的范晔，于道济北征之时，居然“惮行，辞以脚疾”^④。死前，系狱“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尝共畴昔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⑤显然，范晔只能是一介懦弱的书生。至于王融，虽“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谋立子良前，也曾“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而竟未用。临刑，又曾“求教于子

① 《南齐书·王融谢朓传》。

② 《宋书·谢晦传》。

③ 《宋书·谢灵运传》。

④⑤ 《宋书·范晔传》。

良”^①。无疑只是一个志大而才却甚疏的文人。这样看来，谢晦、谢灵运的举兵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其自信。谢晦相信自己的军政干略，谢灵运相信自己的政治才能。范晔、王融则不一样，既无实际干略，又未必相信自己的才能，故其就死，也远不如二谢悲壮。

(二)

从刘裕两次北伐至梁朝灭亡，凡一百四十七年。百余年中，南北之间，大小战争数以十计。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五次，即：义熙五年的灭南燕，义熙十二年的灭后秦，元嘉二十七年的宋魏隔江对峙，天监初年的萧梁北伐，太清年间的侯景乱梁以及随之而来的西魏灭梁。

这几次战争在很多方面都不同。

首先是战争的形势不同。刘裕的两次征讨，都是主动出击。南军纵深突破，远至关中。元嘉二十七年的宋魏对峙，则是北魏大军压境，刘宋仓促应战。天监初年的萧梁北伐，虽然也是主动出击，而战争始终在两淮地区展开。至于侯景乱梁和西魏灭梁，叛军和魏军完全取攻势，梁军完全取守势。

其次，战争的结局不同。刘裕的两次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和后秦两个封建割据政权，收复了中原和关中旧地。义熙五年，刘裕与南燕战，生擒慕容超，灭南燕；义熙十二年，刘裕与后秦战，姚泓出降，灭后秦。这两次战争，刘裕“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门巨野之隘，指麾开辟；关头霸上之□，曾莫藩篱。虏其酋豪，迁其重宝，登未央而洒酒，过长陆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②。

① 《南齐书·王融传》。

② 裴子野《宋略总论》，《全梁文》卷5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下同。

其声势之浩大，战功之卓著，终南朝几代，可谓后无嗣响。元嘉二十七年，北魏以六十万大军南征，宋军分两路应战。一路由王玄漠统率主力，为魏所败，几至全军被歼。侧翼由柳元景指挥，连克弘农、陕县，进逼潼关。然而刘义隆终因主力溃败，下令退军。北魏乃得以连下悬瓠、项城、彭城，渡淮直抵长江，屯兵瓜步，隔江威胁建康。刘宋则将自己的防线步步南撤，由洛阳而滑台，进而又由淮北而至淮南，淮北之地，尽行丧失。较之当年的两次北伐，刘宋王朝的衰落已经有了明显的征兆。裴子野后来曾经不无感慨地写道：“二十七年，偏师克复河南，横蹂强胡百万之众。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设穹庐于瓜步，请公主以和亲。于时精兵猛将，婴城而不敢斗，谋臣智士，折挠而无可称。天子乃朝飧单于，临江高会。于是起尽尸之役，贷富室之财。舳舻千里，缘江而陈，我守既严，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归，我追奔之师，囊弓裹足，系虏之民，流离道路，江淮以北萧然矣。”^①但是，无论如何，元嘉之役，还有“偏师克复河南，横蹂强胡百万之众”的功绩可称。而天监初年的北伐，梁朝用人失当，导致军无斗志，以至元气大损。萧衍弃良将韦睿不用，而以其弟萧宏为统帅。梁军进屯洛口，风雨骤至，萧宏以为魏军来袭，弃军逃回建康。“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②的梁军，纷纷逃散。北魏集中大军南下，围攻钟离。钟离军民死守却敌。梁朝派韦睿增援，才扭转大败的局面。萧衍为阻止魏军南下，下令水淹寿阳。北魏固然由此而退，两淮之地，于是也成一片泽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至于侯景乱梁和西魏灭梁，更是梁朝的总崩溃，庾信的《哀江南赋》对此有极为真实沉痛的描写。如其写侯景乱梁。乱前，“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尽之

① 《宋略总论》。

② 《梁书·太祖五王·萧宏传》。

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①以至于“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蕘斩伐，如草木焉。”^②梁朝之腐朽衰弱，于此可见一斑。史家批评道：“国有累卵之忧，俗有土崩之势。开幸人之志，兆乱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驱我入而围天阙。势如破竹，易若转环。万里糜沸，四方瓦解。社稷沦胥，龟玉毁废，事非一夕，其所由来渐矣。”^③由此反观刘裕的两次北伐，一前—后，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

最后，战争的影响也不同。刘裕的两次北伐，壮大军威，振奋民心，使得刘宋—开国，便呈现出—种恢宏的气势。以至于元嘉中尚“户竞战心，人含锐志”^④。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则暴露出南朝的积弱之势。“自此以后，通互市，纳和亲，而侵疆轶戍，于岁连属。”^⑤“偃武修文，更思后会。永明之世，据已成之策，职问往来，关禁宁静。”^⑥“晋世迁宅江表，人无北归之计。英霸作辅，芟定中原，弥见金德之不竞也。元嘉再略河南，师旅倾覆。自此以来，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⑦等等。史家的说法固或有小异，要之归结为—句话，元嘉二十七年以后，南朝再无力对北方取攻势，北强南弱的局面，就此开始形成。所以，元嘉中的宋魏对峙，实为南北关系的—大转折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战，未必就是好事。战争给南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也极大地破坏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

① 《哀江南赋》，《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114页。

② 《哀江南赋序》，同上，第101页。

③ 何之元《梁典总论》，《全陈文》卷5。

④ 袁淑《防御索虏议》，《宋书·袁淑传》。

⑤ 《宋书·索虏传论》。

⑥ 《南齐书·魏虏传论》。

⑦ 《南齐书·王融谢朓传论》。

展。和，未必就是坏事，南北人民的和平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因此不可一概而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对南朝来说，或战或和，不仅可以体现出不同时期国势的强弱，也能看出士族文人士气的涨消。国势强，则士族文人主战者多；国势弱，则士族文人主和者众。主战者多，则士气高涨，主和者众，则士气消落。刘宋与齐梁士族文人之士气的涨消，正是通过这一点表现出来的。

比较而言，刘宋时期士族文人主战者颇多。元嘉初，谢灵运为刘义隆所召，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①灵运大失所望，“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曰：‘……昔陇西伤破，晁错兴言，匈奴慢侮，贾谊愤叹。方于今日，皆为赎矣。晋武中主耳，值孙皓虐乱，天祚其德，亦由钜平奉策，荀、贾折谋，故能业崇当年，区宇一统。况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风俱举，协以宰辅贤明，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远命，亦何敌不灭？矧伊顽虏，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机志务，久定神谟。’”^②指陈形势，援古证今，辞意恳切，志气慷慨，充分表现出谢灵运期于事功的性格。元嘉二十七年，吴郡张畅随总统诸军的刘义恭出镇彭、泗，抵抗南侵的北魏大军。当时彭城兵虽多而食不足，刘义恭想弃城南归，沈庆之建议撤向历城，何劭则主张取道郁洲，自海路还京，总之都意在逃跑。北军至彭城十数里，“众咸遑扰，莫有异议”^③，唯独张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与敌一战。刘骏“既闻畅议，谓义恭曰：‘……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期与此城共其存没，张长史言不可异也。’”^④大敌当前，众情汹汹，张畅中流砥立，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元嘉二

①② 《宋书·谢灵运传》。

③④ 《宋书·张畅传》。

十八年春，索虏寇逼，都邑危惧。僧达求人卫京师，见许。”^① 士族文人临敌请缨，在南朝相当少见，王僧达是其中一个。“孝建初，索虏求通互市，上诏群臣博议，（谢）庄议曰：‘……交易爽议，既应深杜，和约诡论，尤宜固绝。’”^② 看来也是坚定的主战派。其他主战的士族文人，还有袁淑、颜竣等^③。

齐梁两代，主战的士族文人则甚少。见诸史籍的主战派，大概只有王融与刘孝绰。“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蠢尔獯狄，敢仇大邦。假息关河，窃命函谷。沦故京之爽垲，变旧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发。北地残氓，东都遗老，莫不茹泣吞悲，倾耳戴目，翘心仁政，延首王风。若试驰咫尺之书，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堕城，纳其降虏，可弗劳弦镞，无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战者也。臣乞以执爰先迈，式道中原，澄浣渚之恒流，扫狼山之积雾，系单于之颈，屈左贤之膝，习呼韩之旧仪，拜銮舆之巡幸。’”^④ 字里行间，迸发出一股英迈之气。刘孝绰作《求豫北伐启》^⑤，观其文，亦王融之流。除此之外，主战派遍寻不得。或许萧齐一代尚不乏人，如孔稚圭《上和虏表》称：“今之议者，咸以丈夫之气，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宁可先屈？”^⑥ 惜不知究是为谁。与此相反，主和者却数见史籍。如萧齐时的谢超宗。超宗“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见，语及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何。’”^⑦ 超宗曾被目为“灵运复出”^⑧，察其言而观其行，祖

① 《宋书·王僧达传》。

② 《宋书·谢庄传》。

③ 《宋书·袁淑传》、《索虏传》。

④ 《南齐书·王融传》。

⑤ 《艺文类聚》卷 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⑥ 《上和虏表》，《南齐书·孔稚圭传》。

⑦⑧ 《南齐书·谢超宗传》。